

“自下而上”式乡村学校变革的 社会支持何以建构

——基于个案 D 小学的扎根理论分析

■ 张文斌

摘要:“自下而上”式乡村学校变革作为学校变革的重要模式之一,其社会支持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选取 D 小学作为研究个案,运用扎根理论构建出“自下而上”式乡村学校变革的社会支持建构机制模型。研究表明,变革发起者是整个建构过程的逻辑起点,而变革发起者自身所具备的人格特质、角色属性、教育理想信念为社会支持的建构塑造了适配与可为的行动空间,在这一行动空间的情境影响下,宣传与展示、动员与协商、资本增值作为具体实践的行动策略贯穿着整个社会支持的建构过程,并最终促进着社会支持的建构。作为建构目标的学校变革,通过驱动变革发起者进一步提升其资本存量进而实现社会支持的巩固与再建构。

关键词:乡村小规模学校;“自下而上”式变革;社会支持;建构机制;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25)06-82-11

作者简介:张文斌,男,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山西大同 037009)。

一直以来,由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以及一系列政策的颁布、实施,使得乡村学校在硬软件设施方面都有了较程度的提升和改善,尤其是在硬件设施上,部分乡村学校已与城市学校相差无几。但是,仍要看到,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历史性积弊,乡村学校发展依然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诸如教师发展动力不足、教师队伍结构失衡、家校社协同机制匮乏、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难以满足教育需要等问题依然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学校也必然要承担起相应的变革重任,这既是社会发展对学校教育提出的具体要求,也是乡村学校在社会急剧变革中求得生存的必然出路。当然,乡村学校变革除了强调内部主体的变革意愿与能力之外,外在的社会支持,特别是可持续的、整体而又适宜的社会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变量。在极个别情况下,这种社会支持对乡村学校变革甚至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就我国学校改革的历史发展进程而言,新中国成立后 60 多年来学校变革都是在政府政策推动和影响下进行的,即“自上而下”式的学校变革,或者说是政府主导下的学校变革。这些政策对管理体制、学校管理制度、教师制度、教学和课程以及学生管理等诸多方面做出相应规定,全面地指导着学校变革的推进^[1]。就社会支持而言,这一模式下对于学校内部管理者来说,只需利用政府所提供的各类资源按时完成上级布置的变革任务即可,而不必要去主动寻求政府所提供资源之外的各种可能资源。与前述“自上而下”的学校变革模式不同,“自下而上”的学校变革则主要指学校内部(包括校长、教师等)因自身发展需要

而开展的自主变革,意味着学校变革发起者(如校长、教师等)需要主动寻求可能的外部支持进而满足学校变革所需。这就使得“自下而上”式学校变革在社会支持建构方面与“自上而下”式学校变革存在明显差异。由此,深入考察“自下而上”式乡村学校变革的社会支持建构机制,对于进一步丰富我国学校变革理论、推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文献回顾

在教育学研究领域当中,“学校变革”这一主题一直广受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现有的关于学校变革的文献中,既包含对学校变革整体性的研究,也有针对具体内容,如组织变革^[2]、制度变革^[3]、文化变革^[4]、教学或课程变革^[5]的研究。而如何变革,即学校变革的模式,尽管相关研究者在表述上存在差异,如政府主导式、自发式、渗透式^[6];外生型、内生和联合型^[7],但大致上可以归纳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上下结合”三类变革模式。在具体的变革过程中,政府部门、学校校长、教师与学生、家长、大学研究人员等都是学校变革的重要参与者,相应的,学校内部主体的变革能力与动力、地方政策偏向、校内外的沟通与联系^[8]、文化资本^[9]等因素也会影响学校变革的发生与持续。

在最初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中,社会支持一般被认为是各种社会形态对社会中存在的弱势群体提供的无偿救助和服务^[10]。与前述所强调的社会支持主要侧重于一种单向的帮助或服务不同,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社会支持更多表现为一种人际间双向的社会互动过程^[11],或者说是支持者与被支持者间“互构”的过程^[12]。这种支持既可以分为在财政、政策、体制、社区、社会舆论等方面的扶持或帮助^[13],也可以分为情感、信息、工具、评估和陪伴五个方面^[14]。不过,尽管相关研究者大都肯定了社会支持对于个体身心健康^[15]、政策执行^[16]等方面的正向作用,但

个体特征^[17](如性别、民族、文化程度、年龄等)、城乡^[18]、个体与社会支持的互动^[19]等也会影响社会支持的效果。

具体到乡村学校变革的社会支持,研究者探讨了政府的资源分配与干预^[20]、学校外部社会资本的积累^[21]对乡村学校变革的影响,并主张构建家校共同体、充分运用政策与资源、汲取社会各界力量^[22]。

综上,近年来学界关于学校变革、社会支持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也要看到,已有研究在“自下而上”式乡村学校变革的社会支持建构的微观分析上尚存不足,有待进一步探讨和澄明。事实上,在“自下而上”式乡村学校变革过程中,各种社会支持并不总是“先在的”,而是通过社会支持的提供者与接受者间的持续互动进而不断被“激活”与“建构”^[23]。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通过对个案D小学的变革历程及其相应的社会支持状况进行系统性分析,探索“自下而上”式乡村学校变革的社会支持建构机制,以扩展和丰富已有研究成果,为乡村学校变革实践提供一定启示。

二、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强调从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现象中提炼概念、建构理论,是一种归纳式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过程。本文采用斯特劳斯和科宾(Strauss & Corbin)提出的程序化扎根理论作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对被访者的深度访谈获取原始资料,借助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式编码三级编码方式进行资料的比较与分析,抽象出相关概念、范畴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得出“自下而上”式乡村学校变革的社会支持建构机制模型。

(一) 案例选择与数据收集

基于研究目的本身以及研究资料的可获得性,研究采取目的性抽样(或称“理论性抽样”)的策略,选择D小学作为研究个案。D小学位于甘肃省静宁县城川镇,截至2023年春季学期,学校

在校生人数共 19 人,其中四年级 6 人,五年级 6 人,六年级 7 人。

之所以选择 D 小学作为研究个案,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其一,案例学校切合研究主题与研究需要。D 小学作为众多乡村小规模学校中的一员,在 W 校长 2015 年上任之后,以学校社团为抓手进行了“自下而上”的学校变革,并在此基础上,经过提炼、总结形成了以“苹果”为元素的 6 大主题活动和 5 门小苹果课程。除此之外,在 D 小学校长 W、T1 校长等多人的共同努力下,2017 年成立了最初包括 3 所乡村学校在内的村小联盟。在这一学校变革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其他同类型学校、高校、家长以及众多公益组织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进来,极大地助推了案例学校变革。其二,W 校长大力支持研究者开展研究。如何“真正”进入研究现场是质的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作为学校“守门人”,W 校长对本研究的支持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研究者能否顺利进入研究现场以及获取研究资料的质量。在研究者调研过程中,W 校长不仅接受了研究者多次的访谈,还帮助研究者主动联系了 T1 校长、村文书、学区领导等其他被访者,从而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研究者在调研过程中获取与研究目的相关的研究资料的丰富性。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研究者基于先前编制的访谈提纲,围绕学校变革历程、不同主体对于学校变革的态度、不同来源社会支持的建构过程等几方面,在 2023 年 4 月-7 月期间,先后对学校校长、教育部门管理者,以及部分教师、家长共 12 人(表 1)进行线下的半结构式访谈,访谈时长共计约 21 小时。在征得被访者同意的情况下,访谈者对访谈内容进行全程录音。将访谈资料转录为文本后共形成文字性资料约 35 万字。转录完成后,研究者运用质性分析软件 Nvivo11.0 进行数据分析和编码。为判断研究所建构的机制模型是否达到理论饱和,研究者从获取的访谈文本资料中预留出 3 份样本(W 校长、D 校教师、家长各一份)用于饱和度检验。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类别	姓名编码	性别	年龄	备注
校长	W	男	41	D 小学校长
	T1	男	41	联盟校校长
D 校教师	T2	男	45	兼教导主任
	T3	女	38	/
	T4	女	50	/
	T5	男	24	志愿者(本科在读)
学区领导	T6	男	52	原分管教学
	T7	男	55	分管营养餐、原 D 小学校长
家长	T8	女	40	/
	T9	女	40	/
村文书	T10	女	25	2020 年至今(任职时间)
	T11	男	58	1987-2020 年(任职时间)

(二) 数据分析与编码

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扎根理论研究的初始编码阶段,这一阶段旨在对原始文本资料进行逐词逐句的阅读分析与检视比较,从而形成初始概念与初始范畴。换言之,研究者需要对原始文本资料进行切分与“贴标签”,形成一系列贴合原始数据的概念,并在概念提取后将相似概念进行归类与提炼,形成范畴属性。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对原始文本资料的阅读分析与“贴标签”后,依据研究主题与初始概念间关系,剔除与研究主题关联性较小的编码,并将相关概念进行归纳、抽象,形成初始范畴。最终,一共提炼出 62 个初始概念,以及包括人格特质、教育理想信念、角色属性、扩展运作空间、拓宽组织边界、增进观念协同、宣传与展示、动员与协商、资本增值在内的 9 个初始范畴。鉴于篇幅有限,此处仅列出部分初始概念范畴及其代表性原始语句。

表2 开放式编码情况

代表性原始语句	初始概念	初始范畴
这方面(指的是去外面找资源)我就不行。怎么说呢,就是他比较“社牛”,自来熟的那种	性格外向	人格特质
我骨子里就有这种性格,就是只要是正确的事情,一有什么想法就去尝试、实践	勇于尝试	
他的那个特点就是你批评我全盘接受,他也不会生气。就是你把他批评了,他很快就会调整,就会纠正	虚心接纳	
……	……	
我的理想就是,我要寻找体制内村小发展的一种可能,那么我就不能只是把学生成绩教好	教育理想	教育理想信念
在我的这个理念中,就是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许曾经就是因为老师们抱怨,就是因为家长要赶我走,然后我就更加努力要把它做好	坚定信念	
……	……	
不管谁来学校考察,肯定也是直接来找我	代表学校	
你像这次画这个文化墙,都是W他找外面的人画的,后面人家不来了以后就组织我们这些老师画	组织调动	扩展运作空间
……	……	
尤其像学校,你想让所有人都齐步走是不可能的。先找两个人愿意和你做的,做着做着他就看到做和不做不一样,你看人家做了得奖了,学生考得好,那么我们也这样去做	观念浸润	增进观念协同
所以慢慢我们就有了很多交集,发现都是一些想干事的人。加上我们那时候也都刚30出头,都比较有闯劲,所以就讨论要成立这么一个联盟	同频吸引	
……	……	
……	……	
这个事(家长投诉)我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做好宣传与沟通	宣传沟通	宣传与展示
上完课了你及时地去把孩子的这种参与的照片发到群里,家长也会去转发点赞,然后学校也有这个公众号家长也会去看,他就渐渐地去渗透和明白,它是一个整体的一种环境和氛围的营造	线上展示	
端午节的时候也会叫上家长、学生,在学校食堂包粽子、炒菜,家长也会拿一些水果、饮料,然后一块过端午节,就感觉像是一家人。	线下共育	
……	……	
他获得那个“马云乡村校长”以后,教育局也看到了一些成果,所以后来也就支持比较多一些	称号获得	资本增值
反正就是只要成绩好,你爱咋弄咋弄。现在就是娃的成绩好了,所以很多就是不反对了,所谓“一白遮百丑”么	提高成绩	
因为变革,我们学校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	学校影响力	
……	……	

2.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是对初始编码进行持续的比对与分析,以确立类属及范畴间的逻辑关联,形成更高层次、更具概括性的主范畴。这一阶段的编码工作本质上是对范畴的进一步聚类分析,研究的关注点也开始从原始文本资料转移到编码本身。本研究通过主轴式编码将开放式编码得到的9个初始范畴归纳为变革发起者、行动空间、行动策略3个主范畴,初始范畴与主范畴的对应关系及其范畴内涵见表3所示。

表3 主轴式编码情况

主范畴	对应范畴	范畴内涵
变革发起者	人格特质	个体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表现出的个体特征
	教育理想信念	个体对教育理想的奉行与执着追求
	角色属性	校长作为学校法人代表所赋有的职、权、责
行动空间	扩展运作空间	既能够充分调动校内资源,又能够代表学校开展交流合作
	拓宽组织边界	提升校外社会资本,降低不同社会支持提供者间的沟通成本
	增进观念协同	吸引具有相同观念的组织或人群,转变部分主体消极的支持意愿
行动策略	宣传与展示	通过多种线上与线下的方式,使外界了解学校变革相关信息
	动员与协商	借助校长个人直接或间接交往关系实现支持建构,并就支持条件、支持内容、支持时间等进行协商
	资本增值	校长个人在文化资本、符号资本上的提升,学校校内外社会资本增加

3. 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与主轴式编码的基础上,以“故事线”的形式来呈现范畴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将抽象化范畴纳入到一个可自我解释的理论模型中^[24]。本研究对所提取的主范畴及其逻辑关联进行分析比较,并结合原始文本资料的反复验证,构建出“自下而上”式乡村学校变革的社会支持建构机制模型(见图1)。该模型故事线为:变革发起者是整个建构过程的逻辑起点,而变革发起者自身所具备的人格特质、角色属性、教育理想信念为社会支持的建构塑造了适配与可为的行动空间。在这一行动空间的情境影响下,宣传与展示、动员与协商、资本增值作为具体实践的行動策略贯穿着整个社会支持的建构过

程,并最终促进社会支持的建构,而作为建构目标的学校变革,通过驱动变革发起者进一步提升其资本存量进而实现社会支持的巩固与再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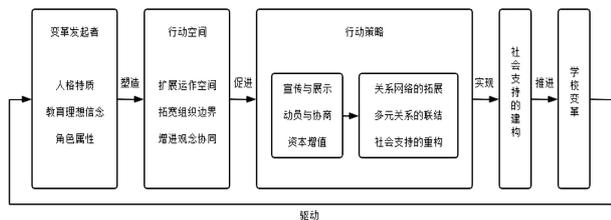


图1 “自下而上”式乡村学校变革的社会支持建构机制模型

4. 饱和度检验

“饱和度是衡量研究资料是否满足理论建构所需的重要指标,以判断资料收集是否充足和理论建构是否充分。”^[25]即是说,在研究过程中,当资料收集与分析进行到一定阶段时,面对新的访谈资料,无法产生新的概念或范畴,说明现有数据已能够充分反映理论模型的结构,无需再进行进一步的资料收集与分析工作。为了检验上述理论模型的饱和度,本文使用先前预备的文本资料进行再次编码,未发现其他新生概念与范畴,说明本文的概念范畴与机制模型基本达到理论饱和。

三、“自下而上”式乡村学校变革的社会支持建构机制模型阐释

(一) 作为建构起点的变革发起者特征

由图1可知,学校变革的发起者是整个社会支持建构过程的逻辑起点,这意味着在外部环境相同的条件下,变革发起者自身的人格特质、角色属性以及教育理想信念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支持建构的发生与过程演进。

1. 人格特质

所谓人格特质,是指“个体在较长周期内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形成的一种相对平稳的个体特征,人格特质具有独立属性,且可以影响个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26]在D小学学校变革的社会支持建构过程中,作为社会支持提供者的一方大多时候并非是主动提供学校所需的各类支持,而依赖于作为变革发起者的W校长的主动建构。

在这一过程中,T1校长如此评价W校长,“W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人……去结识一些有思想的人,这也是他的强项,这方面(指的是去外面找资源)我就不行。怎么说呢,就是他比较‘社牛’,自来熟的那种,就是跟别人见一面,他觉得这个人很厉害、有思想,他就会向人家请教学习……他的那个特点就是你批评我全盘接受,他也不会生气。就是你把他批评了,他很快就会调整,就会纠正,这也可以说是他的很大的一个优点。”可以说,W校长自身所具有的勇于尝试新事物、外向的性格特征、善于接受别人意见和建议等人格特质都为日后发起学校变革、建构多元的外部支持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2. 教育理想信念

教育理想信念,即是个体或群体对所体现最高教育目标的理想的信奉,是理想信念在教育层面上的具体化,它既包括教育理想目标必然实现的相信,也包括对教育理想的奉行与执着追求。对于教育者而言,教育理想信念是其个体价值观、人生观的集中体现,而是否拥有坚定的教育理想信念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自身的教育教学行为。对于W校长来说,“……我从小生活就很坎坷,是教育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是一个骨子里就很热爱生活的人……我不想过那种就是说三点一线的生活……让他们觉得能够在学校里面体验到不一样的东西……”而且,“作为一个人,你要想清楚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比如像那个丑小鸭中学的校长,他就是为了他的理想,把那些没人要的孩子、自杀的、吸毒的,他把这些孩子都教到步入正轨。比如说我的理想就是,我要寻找体制内村小发展的一种可能,那么我就不能只是把学生成绩教好。”

上述W校长对其自身教育理想信念的描述,实际上从侧面阐释了其发起“自下而上”式学校变革的动力来源。而且,正是由于拥有这一坚定的教育理想信念,才使其学校变革理念得到众多外部社会支持提供者的认同,并由此建构起多元的社会支持。即便面对部分家长的质疑,W校长

表示,“在我的这个理念中,就是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许曾经就是因为老师们抱怨,就是因为家长要赶我走,然后我就更加努力要把它做好。”可见,在案例学校变革过程中,W校长的教育理想信念不仅直接关系着其“为何发起学校变革”,同时,在学校变革的社会支持建构中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其一是得以链接众多外部社会支持的中介,即是说,作为有意为乡村教育提供支持的提供者如若与所要对接的乡村学校(或校长)在价值观念上无法统一,则很难建构起相应的社会支持;其二是得以从容面对各种困难、不断寻求外部支持的精神支柱,坚定的教育理想信念在部分家长以及乡镇学区对于案例学校变革的支持意愿转变过程中无疑发挥着关键作用。

3. 角色属性

一般认为,角色并非是由自我认定的,而是社会或群体对其赋予的某些特定的规范性行为和态度模式^[27]。当然,对于同一角色,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所规定的行为规范也会有所不同。作为一校之“长”,其角色属性与特征决定了校长对内负有教育教学与行政管理等责权,对外能够代表学校开展相应的交流与合作。在案例学校变革过程中,作为变革发起者的W校长,其自身的角色属性要求其不仅要关注校内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以及学校未来的整体发展规划,同时,也能够代表学校参与对外交流合作、对接各种外部资源,这就有利于校长在社会支持的整体建构过程中通过角色本身所赋予的权责扩展相应的运作空间,进而为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提供便利条件。在这一过程中,正如W校长所说,“很多外部的支持都是我对接的,一是我比其他的老师认识的人可能多一些,再一个就是,不管谁来学校考察,肯定也是直接来找我。”

(二) 基于变革发起者特征的空间生产

如图1所示,作为学校变革的关键行动者和发起者,校长自身所具备的人格特质、角色属性与教育理想信念为学校变革的社会支持建构塑造了

适配与可为的行动空间,使得学校变革发起者能够在这一空间内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进而实现社会支持的整体建构成为可能。

1. 扩展运作空间

应该说,校长的角色属性赋予了其不同于学校教师的活动空间。就乡村学校教师而言,特定的情境因素与资源条件,例如教师自身的被管理者身份、有限的交往空间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校外部社会支持建构的可能性。而且,即便是学校教师借助其人际关系所建构起的社会支持,也需要校长这一层面予以同意方能进入到学校。与学校内一般教师不同的是,在既有的角色属性加持下,学校变革中社会支持建构的运作空间能够进一步得到扩展。具体的,一方面,校长能够利用其角色所赋予的管理者身份适时调动学校内的组织资源(包括教师、教室等)来推进各类社会支持的整合与利用,进而实现社会支持的效用最大化,以便在增强社会支持提供者的信心的同时,推进学校变革的进程。换言之,校长作为学校的“守门人”,各种外部支持能否对接到学校并发挥其最大效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另一方面,校长作为学校的“法定代理人”,能够充分利用其自身角色代表学校开展相应的交流合作与资源对接,进而提升社会支持建构的可能性。

2. 拓宽组织边界

学校变革中社会支持的建构与学校本身的社会资本、校长的关系网络密切相关。实际上,在社会支持的建构过程中,作为社会支持提供者的一方必然存在着不同种类的机构、部门或组织,尽管这些不同种类的机构、部门或组织都可能有意向对正在推进变革的学校提供一定的社会支持,但这些社会支持提供者本身的利益考量、交往边界等因素都有可能弱化,甚至是抵消学校变革中社会支持的建构。而作为一校之长,能够充分借助其自身的人格特质、教育理想信念以及相应的关系网络,在达成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支持建构过程中社会支持提供者及学校各自组织边界的拓宽,达至不同社会支持提供者以直接或组合

的方式与学校对接,进而为实现学校变革中多元的社会支持体系建构提供行动空间。这其中,既包括将可能的社会支持提供者发展、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直接的社会支持提供者,也包括校长作为“中间人”,降低不同类型的机构、部门或组织间的交往和沟通成本,在基于信任的关系网络中实现学校变革的多元协同支持。

3. 增进观念协同

应该说,外部社会支持提供者与乡村学校的顺利对接,本质上是基于双方相互信任基础上的观念协同。换言之,在乡村学校变革的过程中,如果作为社会支持提供者的一方与学校本身或者变革发起者,即校长的变革理念存在差异或冲突,那么,相应的学校变革的社会支持也不可能建构起来。于是,对于校长自身来说,需要在不断加强自身学习、更新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借由自身关系网络的搭建,从而吸引更多具有相同或相似观念的人群或组织,或是说改变部分人群或组织的旧有观念,从而更好地为学校变革社会支持的建构提供基础与行动空间。访谈过程中,W校长不止一次地提到,“在寻求外部支持的过程中,你需要考虑对方的理念是否和你一样,只有在这方面达成共识,你才能谈后续怎么支持和支持什么。”

(三) 作为建构策略的具体实践与行动

基于变革发起者特征所塑造起来的有利于社会支持建构的行动空间,包括扩展运作空间、拓宽组织边界、增进观念协同,都为变革发起者采取因应的行动策略提供了便利。在案例学校的变革过程中,宣传与展示、动员与协商、资本增值作为具体实践的行動策略,是实现学校变革社会支持建构的关键要素。

1. 宣传与展示

在案例学校变革推进的过程中,作为变革发起者的W校长通过多种方式对学校所进行的变革以及取得的相应的成果进行了展示和宣传。具体的,W校长利用外出参与培训和相关会议契机讲述学校变革历程与个人经历,在个人微信朋友圈以及简书和学校公众号上发布学校变革与乡土

课程教学等相关信息,邀请家长共同参加学校各类实践活动,组织学校教师以及外部力量合作编写乡土教材与学生用书、创办联盟内刊、利用空闲教室陈列各种过程性资料等多种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外界了解学校相关信息、及时掌握社会支持的利用情况、学生发展的客观表现提供了较为便捷的通道,也有利于W校长个人关系网络的建构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增强社会支持提供者的信心,从而为后续学校变革过程中获取更为多元的社会支持奠定基础。

而在建构个人“关系网”的过程中,由于关系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又有其以自身为中心的各自的关系网,因而使得整个关系网络具有相当的延展性,从而形成一个庞杂的关系网。对于处在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而言,这种具有延展性的关系网络不仅有利于行动者之间直接交往关系的建立,同时也为以某一行动者为中介、进而形成不同行动者之间间接交往关系的建立,或是在交往过程中由原来的间接交往关系演变为直接交往关系提供了可能。

2. 动员与协商

动员,作为发动特定对象参与某种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同样在社会支持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说前述的宣传与展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包括W校长在内的学校社会关系网络,那么,动员就为社会关系网络进一步转化为支持网络创造了条件。在结构主义看来,社会关系网络仅仅是一种关系的表现,“这些关系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能够提供必要的帮助”^[28]。即是说,只有当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个体或组织能够为特定行动者提供相应帮助或资源时,社会关系网络才能够转化为支持网络。在“自下而上”的案例学校变革的社会支持建构过程中,大体存在两种动员方式。一种是直接动员,即利用变革发起者——校长与其关系网络中的其他行动者间的直接交往关系,为其自身或学校提供某种支持,以推进学校变革的进程。而且,借助于这些建基于个人关系网之上的、具有丰富资本(如符号资本、文化资本、政

治资本等)的社会支持提供者,也能够间接提升W校长及其学校的“日常权威”,从而在乡村学校变革中吸引更多的外部社会支持。另一种是间接动员,即借助于关系的中介实现关系网络中处于间接交往关系的行动者间的交互。通过这种间接动员,能够实现关系网的延伸,从而提供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

当然,在动员的基础上,协商也是学校变革过程中社会支持建构的重要一环。正如W校长自己所说,与公益组织对接过程中,“这其实都是一种双向的需求。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说你愿意支持就支持,不愿意我也不能强迫人家一定要支持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很真诚地和人家聊,如果你的价值观和我相同,我们就一起做。至于支持什么、怎么支持都得和人家聊。”除了与公益组织的对接之外,高校、企业、教育管理部门等社会支持提供者在为案例学校提供社会支持的过程中也同样内含着协商环节,即多方主体在共同价值取向与愿景的基础上,就支持内容、支持时间、支持条件等达成一致,从而实现“共赢”目的与社会支持的建构。

3. 资本增值

应该说,W校长通过一系列的宣传与展示、动员与协商,极大地丰富了个人以及学校的社会资本,因而,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资本增值一定程度上是宣传与展示、动员与协商的结果。与此同时,在推进学校变革的过程中,W校长也通过多种其他自我增值的方式试图进一步提升其个人以及学校整体的资本存量、影响力,进而为学校外部社会支持的建构奠定基础。从功利的角度来讲,即是说,作为社会支持的接受者而言,要“值得支持”。此时,资本增值便作为一种具体的方式或途径,用以实现社会支持建构与学校变革的结果。正如W校长所说,“我在做的过程中就是把自己变‘值钱’。”

在其个人方面,W校长通过参加各种自费或非自费的培训学习、走访国内外部分学校、广泛阅读专业书籍、参与读书会、撰写教育论文与教育反

思等途径,较好地提升了个人的文化资本。而且,由于在推进学校变革过程中开展的各种教育实践活动取得的成效,W校长于2018年、2019年分别获得了“马云乡村校长奖”和“全国科技好校长”荣誉称号。符号资本,作为一种广受认可的稀缺性资源,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行动者的正当性、信誉以及影响力。无疑,W校长荣誉称号的获得既是其行动长期积累的结果,同时又为其社会关系再生产以及学校整体影响力的上升、社会支持的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在学校整体方面,在以W校长为中介的学校社会网络拓展的同时,W校长也通过利益显性化、变革管理方式等具体途径进一步加强了学校内部的凝聚力。于是,校内社会资本与校外社会资本的共同增值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学校的话语权,促成了学校变革过程中多元社会支持的建构。

4. 三者合力下的聚合效应

如果说前述宣传与展示、动员与协商、资本增值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建构方式而存在,那么,在此基础上所实现的关系网络的拓展、多元关系的联结与社会支持的重构便是案例学校变革中社会支持建构的直接方式。当然,在此过程中,宣传与展示、动员与协商、资本增值并不总是单独发挥作用,而是可能以一种组合形态出现并共同作用于后者(关系网络的拓展、多元关系的联结或社会支持的重构)。实际上,学校变革的社会支持建构本质上是一种构建关系网络的过程。此时,如果按照一般的关系网络建构阶段来划分,关系网络的拓展明显属于“寻找关系”阶段,而多元关系的联结与社会支持的重构则属于“编织关系”阶段^[29],并共同助力于社会支持建构这一目标的实现。

在关系网络的拓展方面,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是争取并建构外部社会支持的重要基础。实际上,对于乡村学校变革而言,基于血缘或地缘而建立起来的先赋性人际关系由于其在关系建立过程中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大,因而在社会支持的建构中的作用也往往十分有限。而相应的,基于各自需要、喜好、价值取向等个人意愿建立并

形成的相互关系,即获致性人际关系^[30],因其资源投入、关系建立或中断往往取决于个人意志,因而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外部社会支持建构的灵活性和广泛性。换言之,只有拥有足够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才能够为后续的“编织关系”提供可能。

在多元关系的联结方面,案例学校变革过程中涉及诸多不同的社会支持主体以及由此构成的联结方式多元的各类关系。在这多元关系的联结之中,尽管受各类社会支持主体自身性质、资源等因素影响,其联结的方式有所差异,但无疑都指向案例学校。在案例学校变革过程中,这种多元关系的联结包括社会支持提供者与学校结成的契约合作关系、松散合作关系(这类关系通常不具有强制性、持续性),以及W校长与部分个体所建立起的密切的个体间关系。由此,经由这种多元关系的联结能够最大程度上发挥案例学校自身的能动性以及各类社会支持提供者自身的优势,从而有利于实现外部社会支持的建构与案例学校变革的推进。

在社会支持的重构方面,应当承认,在“自下而上”的学校变革中,由于变革暗含着某些关联主体的利益重组,部分外在的社会支持提供者并非一开始就作为积极的一方加入其中,如何转变其支持意愿就显得尤其重要,这是学校变革能否持续推进的重要条件。因而,社会支持的重构亦是学校变革中社会支持建构的重要一环。在案例学校变革过程中,社会支持的重构主要体现在家长群体和教育管理部门这两个主体上。在家长群体方面,在宣传与展示、动员与协商、资本增值等一系列行为综合作用的基础上,部分家长的支持意愿由起初的反对逐渐转变为“有条件的支持”。而在教育管理部门这一方面,则主要是通过上下级教育管理部门间的“压力下沉”来实现支持意愿的转变。

(四)作为建构目标的学校变革反作用

在案例学校变革过程中,促进学校变革是学校变革发起者,即W校长进行社会支持建构的最终目

标。换言之,社会支持的建构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学校变革进程。

从案例学校社会支持建构的实际效果来看,随着社会支持不断完善与延展,不同的社会支持提供者通过提供相应的社会支持确实在客观上推进了案例学校本身的变革进程,这既体现在案例学校乡土课程建设的不断完善与优化上,也体现在村小联盟的良性运转与影响力扩大这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围绕着学校变革,包括校长在内的案例学校本身的资本也在不断增加,这里既包含各类社会支持提供者为了肯定校长工作以及更好地推进案例学校变革而施加于W校长的直接作用力,诸如各种荣誉称号、证书等的颁发,基于信任的主动联结等,也涵盖校长为了进一步实现社会支持建构与推进学校变革而进行的自我增值。

于是,此时在变革发起者(即W校长)、社会支持建构、学校变革之间便形成了一种闭环(如图2)。一方面,学校变革发起者通过建构良好的社会支持促进学校变革,另一方面,学校变革又作为一种反作用力,通过提升包括校长在内的案例学校的资本存量继而进一步实现社会支持的巩固与再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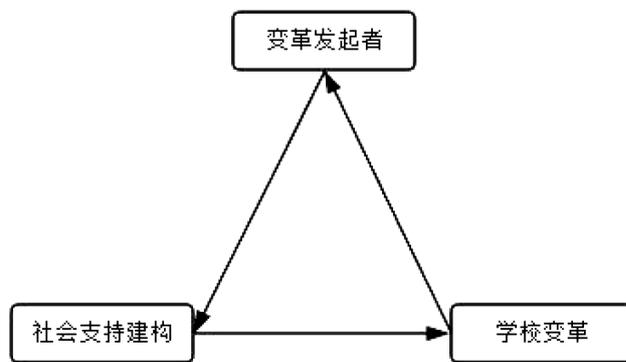


图2 “变革发起者—社会支持建构—学校变革”逻辑关系图

四、结语

本研究基于教育改革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聚焦“自下而上”这一学校变革模式,采用扎

根理论研究方法,探究了“自下而上”式乡村小规模学校变革的社会支持建构机制。研究表明,在“自下而上”式乡村小规模学校变革中,各种社会支持并不总是“先在的”,而是需要在社会支持提供者与接受者间的不断互动中“激活”与“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变革发起者是社会支持建构的逻辑起点,其自身所具备的人格特质、教育理想信念、角色属性能够为社会支持建构塑造适配与可为的行动空间,并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促进着社会支持的建构。而作为建构目标的学校变革能够通过驱动变革发起者进一步提升其资本存量,进而实现社会支持的巩固与再建构。由此可以引出以下结论:

第一,校长是“自下而上”式乡村小规模学校变革中社会支持建构的关键行动者。作为学校的“法定代理人”,校长既能够最大程度上组织调动校内资源实现外部社会支持的有效利用,在对外开展交流合作过程中也深刻影响着社会支持网络的质与量。

第二,资本是“自下而上”式乡村学校变革中社会支持建构的重要变量。在“自下而上”式乡村小规模学校变革中,学校本身的资本存量越多,越能够为社会支持的建构提供充足的议价空间,进而有利于外部社会支持的建构。

第三,建构是“自下而上”式乡村小规模学校变革中社会支持构筑的本质。作为一种建构行动,其本身蕴含着社会支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种动态变化的过程。这一动态变化既蕴含着社会支持提供者与接受者(学校)间因利益目标耦合或冲突而达至的关系建立与断裂,也内含着社会支持提供者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在内容、形式、意愿等方面的转变。

研究运用扎根理论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尽管在研究过程中遵循了由开放式编码到主轴式编码,再到选择式编码的一般编码程序,但在概念提取、范畴整合与模型构建中仍不可避免地带有研究者自身的主观性。此外,由于研究仅选取了D小学一所学校作为研究个案,因而在

结论上也具有一定的情境性和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以此研究为基础,通过继续挖掘新的概念范畴、增加样本数量等方式,不断优化和改进本研究所构建的机制模型。

参考文献

- [1] 凡勇昆, 郭志辉. 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的类型研究[J]. 现代教育管理, 2014(1): 27-33.
- [2] 沈亚芳. 学校组织变革及其路径选择的新制度经济学解释[J]. 教育发展研究, 2013(24): 27-31.
- [3] 康永久. 当代公立学校制度变革研究述评[J]. 比较教育研究, 2004(11): 16-20.
- [4] 孟瑜. 学校文化变革的受阻原因、实施方法及阻力应对[J]. 教学与管理, 2016(6): 16-18.
- [5] 黄超, 代建军. 从“外源型”走向“内生型”: 学校课程变革的内在超越[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0(25): 56-60.
- [6] 刘国艳. 制度分析视野中的学校变革[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07: 34-35.
- [7] 范敏. 论学校变革模式与变革机制的关系[J]. 现代教育论丛, 2013(3): 93-96+47.
- [8] 邓凡. 农村学校变革的阻力及其消解[J]. 教学与管理, 2021(10): 43-47.
- [9] 刘国艳. 农村学校变革中的文化资本阻滞及其建构[J]. 教育探索, 2015(2): 16-19.
- [10] 陈成文. 社会弱者论[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0: 157-158.
- [11] 程虹娟, 张春和, 龚永辉. 大学生社会支持的研究综述[J].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1): 88-91.
- [12] 杨海龙, 楚燕洁. 社会资本与“互构”的社会支持[J]. 理论导刊, 2007(7): 42-43.
- [13] 吴康宁.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需要怎样的社会支持[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3(6): 1-5.
- [14] 牛爽爽, 邓猛. 融合教育背景下的残疾学生社会支持系统探析[J]. 中国特殊教育, 2015(9): 3-8.
- [15] 李泽英, 胡锦涛, 吴荔红. 幼儿教师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的关系研究——基于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检验[J]. 教育评论, 2022(7): 99-104.
- [16] 阮博. 论公共政策的社会支持系统及其优化[J]. 理论与改革, 2011(6): 16-19.
- [17] 丁锦红, 王净. 在校大学生社会支持状况研究[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0(1): 114-116.
- [18] 赵艳. 城乡小学教师职业倦怠、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19: 26.
- [19] 姜书睿. 初中生感知社会支持与学业成就的关系——希望与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20: 32.

- [20]王瑾. 乡村学校变革路径分析——基于三所乡村学校的经验[D]. 新乡:河南师范大学,2019:21-23.
- [21]刘国艳.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村学校变革[J]. 当代教育科学,2020(9):70-76.
- [22]温仓金. 教育人类学视野下民族地区乡村学校变革的个案研究[D]. 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21:114-115,126-128.
- [23]吴苏,刘能. “支持激活”与规范的日常呈现——规范“具体化”视角下城市流浪者的街头生活[J]. 社会学评论,2023(6):187-210.
- [24]Straus, A., & Corbin, J.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M]. Newbury Park: Sage, 1990:116.
- [25]朱守信,程天君. 非师范专业人员“转行从教”的身份建构: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4(10):69-82.
- [26]赵延昇,周静静. 90后大学生人格特质与创业意向关系研究——以自我认同感为调节变量[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16-124.
- [27]杨习超.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研究[D]. 苏州:苏州大学,2016:38.
- [28]张友琴. 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城乡比较研究——厦门市个案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01(4):11-21.
- [29]秦海霞. 关系网络的建构:私营企业主的行动逻辑——以辽宁省D市为个案[J]. 社会,2006(5):110-133+207-208.
- [30]杨宜音. 试析人际关系及其分类——兼与黄光国先生商榷[J]. 社会学研究,1995(5):18-23.

Research on the Social Support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the “Bottom up” Rural School Reform

— A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Based on Case Study of Primary School D

Zhang Wenbin

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odels of school reform,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upport for the “bottom-up” rural school reform is a complex dynamic process. This study selects Primary School D as a research case and uses grounded theory to construct a social support construction mechanism model for the “bottom-up” rural school reform.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reform initiator serves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entir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their personality traits, role attributes, and educational convictions shape an adaptive and feasible action spa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upport. Within this action context, publicity and demonstration, mobilization and negotiation, and capital appreciation as specific practical action strategies run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of social support construction, and ultimat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upport. As the construction goal, school reform drives the initiator to further enhance its capital stock, so as to achieve the consolid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support.

Keywords: small-scale rural schools; “bottom-up” reform; social support; construction mechanism; grounded theory

责任编辑:程方生